

# 关于明词研究新体系之建构前提的思考<sup>\*</sup>

叶 晔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随着《全明词》及其补编的问世,明词研究异军突起,成果斐然。但总的来说,仍以对明词的文献整理和总括还原为主,深层次的挖掘和阐释尚未形成规模。接下来十年,将是明词研究走向纵深的十年,各类深入式的对话、商榷和重构,将取代平铺式的主题研究,成为明词研究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厘清明词与唐宋词、金元词、清词、近代词在发生学上的根本文化歧异,提供一套与明词特性相匹配的话语系统,将是明词研究的长远目标。而廓清和指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是建构这套明词研究新体系之基本前提。明词研究的前路实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明词研究 话语系统 换代意识 经典化

与唐宋词、金元词、清词、近代词相比,明词一直被视为千年词史中的一个低谷,即使最近十年“词亡于明”的说法已经不再,尴尬的处境却是依然。就连研究明词的学人,在向学界同仁阐发明词的研究价值之前,也会先悻悻地说上一句“明词的确不如宋词、清词”,然后再作高论。其他断代词研究对明词的切割取舍也毫不客气:在元词研究者看来,明初词是元词风雅的余响;在清词研究者看来,晚明词是清词辉煌的先声。这些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文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能以朝代的更迭为断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显现出了明词的落寞和无助。没有了明初的刘基和晚明的陈子龙,以及他们周边的词人群落和词学思潮,明词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连“防守反击”的招数都荡然无存了。如果真是那样,或许有一天,词史的分期将作四个阶段:晚唐至元末明初为高潮期,明代中叶为衰落期,明末清初至近代为第二个高潮期,当代为第二个衰落期。从这样的震荡线路来看,难道日后还有可能出现第三个高潮期?

只要我们仍用当下的文学眼光来观看明词,它的艰难处境就很难有改善。在词史中,它是所有断代词中最不受待见的一环;在明代文学史中,它又在所有分体文学中处于价值较低微的地位。最近十年它受到较多的关注,主要是借了词学研究兴盛的势头,在文献整理相对滞后的明代文学研究中取得了暂时的优势,等到明代辞赋、骈文、八股、尺牍的整理和研究力量崛起后,这种优势将没有现在这么明显。从这个角度来讲,明词绝对是词学研究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它到底是“重”还是“轻”?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它的轻重关系是否会因为时代学风的变化而调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明词研究究竟路在何方?它是否有可能超越其他断代词研究,而作出自己独有的理论贡献?以上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词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多个层面予以廓清和明示,是建立一套明词研究新体系的基本前提。

## 一 “非轻”之路:对明词研究价值的反思与展望

说起明词的“轻”,听到最多的是“词亡于明”或“明词中衰”的论调。这是明词研究中的一大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词》重编及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2&ZD158)阶段性成果。

热门论题。从身处现场的明代词人的自我反思,到本世纪最近十年的各抛新说,四百多年过去了,其原因依然没有定论,恐怕日后也难有定论。其实,笔者以为,与其争论明词“亡”或“衰”的原因为何,不如探究“亡”或“衰”的主流观念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有关这一观念的生成背景,已有学者作了较深入的论析,总结出四百年来抹杀明词地位的三大文学观念,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浙西词派的“醇雅”说和常州词派的“寄托”说<sup>①</sup>。前二者是用宋词的高度来否定明词,第三者则是用诗教的文学观来否定明词。总的来说,以上三类对明词的观察,仍是一种一元价值观的体现,他们不认为同一文体在不同时代可以有多个不同价值取向的发展高峰。对此,余意提出了三剂良方:悬置先见、直面本体和再造话语<sup>②</sup>。不过从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终究也是时代的产物。面对习惯了唐诗宋词的当代学人们,连清词的经典化推进和理论建设都困难重重,更何况被冠以“中衰”之名已四百年的明词。悬置先见或许略有改观,但直面本体和再造话语,恐怕是任重而道远。

自清人以下,我们一直在谈论明词的“轻”,却忽略了一件事,即也有一些晚明清初词人强调过明词的“重”。如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曰:“我朝监于二代,郁郁之文,炳焕宇内。即填词小技,遂出宋元而上,几欲篡其位。”<sup>③</sup>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曰:“尝论前代诸家,文成之于元献,犹兰亭之似梓泽也。新都之于庐陵,犹宏治之似伯玉也。琅玕之于眉山,犹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谨之于幼安,犹宣武之似司空也。逮黄门舍人之于屯田、待制,直如曹、刘之于苏、李,遂觉后来益工……”<sup>④</sup> 类似的观点,在陈子龙、朱彝尊、陈廷焯等人旗帜鲜明的“非明”词学主张下,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当然,也有一些细心的学人留意到了这一现象<sup>⑤</sup>,但更多的人在征引这些史料时,批评多浅尝辄止,未去探究论说背后更深层次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未免可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在用后人的成见揣度前人的想法,用既定的观念来否定当事人的叙说。我不敢说清人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用这样的方式忽视或否定前人的小众说法,是有失严谨的。在笔者看来,词人笔下的“重”是对是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会以明词为“重”。换句话说,钱允治和邹祗谟的观点,与其他“非明”词学家的观点并不冲突,每个人的表述都有自己的叙述语境。钱、邹二人的论述方式,固然有在我们看来很夸大的一面,但也有在他们视角下很合理的一面。把这合理的一面挖掘出来予以深度阐释,或许比对立地否定他们的观点更有讨论的价值。

最早系统地发出“重”的声音的,是民国年间的赵尊岳。他在《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一文中,既总结了明词的六大疵累,也提出了明词不可废的八个理由。即开国时词人特盛,亡国时词人尤多,台阁文会以填词为尚,武职中多有能词者,理学家多有词附集以传,女性词人蔚为大观,道教词亦有传承,盲人治词闻所未闻<sup>⑥</sup>。虽然这些理由本末有差,放在一起论述,有细大不捐之嫌,但较之王昶《明词综》擅改原作、唯雅是选的态度,赵尊岳不作筛选地大规模丛刻明代词籍,已经算是对明词的极大尊重和认同了。至少在20世纪,学界对明词整体价值的判断,没有超出赵尊岳的认知范围,甚至本世纪初问世的《明词史》和《全明词》,也带有受《明词汇刊》文献影响的明显印迹。

以上从明清至近现代,无论词人和学者们怎么讨论明词的“盛”与“衰”、“轻”与“重”,有一点基本不变,即他们关注的对象是作为审美形态的明词,这是明词“轻”、“重”的第一个层面。

在大多数人看来,“明词中衰”的根本表现,就是艺术审美特质的缺失。虽说“美”也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标准,但大致的高低上下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再怎么挖掘明词的“异量

①② 参见余意《“词亡于明”的历史考察与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③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8册,第212页。

④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册,第661页。

⑤ 参见朱惠国《论明代的明词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陈水云《清初关于词的“盛”、“衰”之辨》,《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

⑥ 参见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附录第5—8页。

之美”<sup>①</sup>，也不可能达到与宋词、清词相同的高度，至多就是让千年词史的发展轨迹图中的那个波谷不那么深而已。在客观上，我们强调明词是贯穿千年词史的必经之路，作为填补空白的一环，它有被重视的必要性。甚至如唐宋词在明代的经典化问题、明词的创作探索留给清人的宝贵经验等，已不仅是断代词研究所能覆盖的话题，涉及到更宽阔、更长时段的词史视野。但在主观上，这种反拨是一种“非轻”的基调，更多是对研究态度、研究行为的纠正，而不是对研究价值的纠正。

笔者以为，对明词价值作更深层次的挖掘，除了应建立一套明词专有的审美话语外，还需要我们进入到有关明词“轻”、“重”的第二个讨论层面，即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明词。赵尊岳的“八大”说，其实已经从词人身份多样性的角度触到了这一层面。吴熊和先生一直强调唐宋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sup>②</sup>，这一观察视角，我们也可以复制和应用到明词研究中来。

如果我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明词的研究价值，则每篇作品皆有其文化背景，只存在离文学距离远近的不同，不存在作品的高低优劣之分。两万多首宋词和两万多首明词，它们的学术价值是大致等量的。比如明词中看似千篇一律的幛词，却是文人们织构和经营其社交网络的一把利器；小说、戏曲中的开场词和过场词，是明清说唱文学在底层社会文化中适应生存的有力手段；类书中的大量歌诀词，更是明词在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应用。这些在审美上乏善可陈的作品，却蕴含了大量社会文化学的宝贵信息。在本质上，它们和宋词可付诸歌妓宴唱一样，都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回顾过去二十年，这种“文学文化现象”的词研究视角，可谓风生水起，其中可以被明词研究拿来借鉴的东西，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太杂太多。如何在良莠不齐中有所取舍，或许是明词研究能否迅速走上文化研究“快车道”的关键所在。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明词，更适合进行“中观”层面的研究，而且比唐宋词的文化考察更为复杂，因为唐宋词只是唐宋文化的产物，而明词则是前代词和明代文化的综合产物，研究者的“中观”视角，既应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其次，还必须考虑到，这种“文化转向”只是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应该由“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走向“词学之文化学研究”，由文化本位走向文学本位，在更高层面和意义上完成“文学转向”<sup>③</sup>。这种向文本的回归，是唐宋词研究史中的经验之谈，是后起的明词研究在向外拓展之初就应该留意和深省的。

在笔者的思考中，讨论明词“轻”、“重”的第三个层面，应该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明词。这不仅需要给明词建构、搭配一个与之特性相契合的话语系统，更希望从明词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可以为其他断代词研究甚至分体研究提供一些别样的思路和启示。我们现在的明词研究，别说在文本阐释中用的是唐宋词的审美标准，连各种研究方法也是唐宋词研究中的成熟套式。比如说词选研究，跳不出龙榆生《选词标准论》、肖鹏《群体的选择》所建立的一套“便歌、传人、开宗、尊体”<sup>④</sup>或“选型、选域、选心、选阵、选源、选系”<sup>⑤</sup>的话语体系，而龙、肖二著就是建立在唐宋词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审美范式研究，王兆鹏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提出的“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和“清真范式”<sup>⑥</sup>，也是以唐宋词的发展演变为主线的；至于学术界翘首企盼的《宋词通史》，如果真能像预言的那样促成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型的话，也是依托了宋词研究这一成熟的学术平面。我不是说借鉴唐宋词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不好，很多研究对象有跨越时代的共通性，一定程度上的拿来主义是应该提倡的。但一味地借鉴和索取，终究只是落人之后，为什么不去尝试性地引领一下风气之先呢？其实明词研究，在某些领域是有机会自成一套概念和方法，来为其他断代词研究所用

① 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③ 陶然《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④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⑤ 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⑥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的。比如小说、戏曲中的词研究，鉴于明白话小说覆盖了世代累积型创作和文人独立创作两个阶段，明传奇又代表了古代文人戏曲的黄金时代（杂剧中的词屈指可数），若能厘清其中的引用词、化用词、原创词的复杂面貌，则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和规律，基本上可以解决宋、元、清三代小说、戏曲中词的诸种问题。又如明词的功能化和日用化研究，涉及幛词、寿词、乐章词、歌诀词、宗教仪式词等多种类型，它们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类型多样性上，抑或与作品相关的社会文化史料上，都比唐宋金元词要丰富得多，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颇为可惜。这种“领方法之先”的理念，笔者将在后文中作更详细的论述和阐发，此不赘言。

当然，以上三个层面，在学术发展上是有先后次序的。特别是在现今明词研究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从审美的角度对明词文本作更多的研究，建构一套关于明词审美的独特话语系统，挖掘其中的文学内涵和词人本事，适度地推进明词的经典化和普及化，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追求明词与宋词、清词的辉煌遥相呼应，但求这种特定时代下的“异量”美感被更多的人包容、认可和欣赏。至于明词的社会文化属性，本应是明词研究中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块领域，因为词的本体研究离不开整个词坛生态的研究。可惜受到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这一块的研究价值被文学价值所牵连，至今关注的人不多。但客观地说，这部分作品虽然原创性不强，活跃度却是整个明代最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文体的生机和活力为何与文学的艺术价值相背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明词话题。至于更高层面的方法论的提倡和推广，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秉持一种基本态度，即从明词现象中总结出规律和方法来，而不是套用既定的概念和学说去生硬地阐释明词。只要有了这样的理念，加上坚实的文献和缜密的思维，多尝试终归是好事情，没有必要因噎废食，滞步不前。

## 二 “换代”之眼：一代学人视野下的一代词

建构明词研究新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鲜明的“换代”意识，即我们的研究成果应能反映出研究对象的时代递变和研究者思维的代际演进。

所谓“换代”，在笔者看来，至少应该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指一代有一代词的面貌。吴熊和先生在《历代词通论》的总序中说得明白：

面对不同时期的词，通论的写法是可以不同的。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词而言是关键的、不可或缺的问题，却未必是其他阶段词的重点所在。如本丛书中《唐宋词通论》与《金元词通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有所差异。词的起源问题必须在《唐宋词通论》中加以探讨，全真道教词的问题则只能在《金元词通论》中进行展开。这说明通论的形式有可能提供一种富有个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思路。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有整体的判断，梳理出最核心、最本质的若干问题。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可为将来重撰词史提供基本的考察维度。<sup>①</sup>

明词的面貌无疑与唐宋词、金元词大不一样。与唐宋词相比，明词研究基本上不涉及词源、词乐，词体、词调的变化也不明显，词籍重在词选和丛编，词别集和词话的单刻本数量寥寥。与金元词相比，明代既没有少数民族词人群，也没有全真道教词人群；诗词曲的文体互动，明步宋元后尘，积习已久；东亚视野下虽有《皇华集》中的词人唱和，但整个帝国文化已不像元代那样包容和外拓。当然，明代也有区别于唐宋金元的特色，它有前代绝无的山人词人群、女性词人群，有风靡文人世界却被后代嗤之以鼻的幛词和《草堂诗余》，有大量小说、戏曲、类书中的佚名词和托名词，还有词史意义上的第一个词学流派，以及词学地理意义上至关重要的“环太湖词圈”。笔者以为，作为一种中时段的研究，明词中“变”的重要性应大于“不变”，故首先应强调一代词的个性、核心和本质，尽量去突出明词

①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总序》第2页。

的核心且独具的问题。其中哪些是独具的或首创的,是为表象,研究者一眼即可看出;但哪些是核心的、反映本质的,则需要我们作更深入、全面的考察后方能断言。比如诗词曲的文体互动问题,在明词中出现了较之宋元词更为复杂的情况,即使陶然在《金元词通论》中已有专章论述,胡元翎近年来亦有关于“明词曲化”的系列论文发表,但作为明词的核心问题,笔者觉得仍有作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又如断代词的易代归属问题,虽然明知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话题,但随着新编《全明词》项目的开展,“何为明词”已成无法回避的当务之急,如何在陶然《金元词通论》提出的断代原则<sup>①</sup>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更符合明词特性的界定标准并付诸实践,也是相关研究者有责任去解答的一个问题。

“换代”的第二层意思,笔者以为,指一代有一代学人的观念。代有传承,固然很好,但代有变化和革新,却是更好。不同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们观察事物的维度也是迥然有别,学界的研究应该由数代学人的多层观察维度所构成,这样才能使明词研究的内涵更为丰富。就明词研究而言,张仲谋、周明初、丁放、邓子勉、陶子珍、胡元翎等先生属中年一代,而余意、张若兰、汪超等同仁属新生代,他们在研究观念、旨趣和方法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相互补益的。从我有限的接触和阅读来看,现今越来越多的学人,希望在明词“异量之美”的基础上,厘清明词与宋词在发生学上的根本文化歧异,而不是简单地用唐宋词的价值标杆去考量和评判明词<sup>②</sup>。一旦落入后者的窠臼,别说明词在千年词史中永难翻身,就算清词也难逃二流的文学定位。反之,如果能够建构起一套与明词自身特性相匹配的话语系统,那么,很多让唐宋词研究者心生疑惑的明词现象,将得到一个更加合理、清晰、深刻的解释。即使最终无法提升明词的文学史地位,至少可以让我们理解近两千位明词作者的创作用心。这种尝试,决不是对明词研究价值的自我鼓吹和标榜,而是用更近距离的现场感去体察和感悟明词及其周边事物。这种观察所得到的结果是否令人满意姑且不论,至少它不会像清人那样高高在上地脱离明词的文学生态环境而作一己喜好之言。从严迪昌先生提出词学研究应有“‘异量美’式的气度”<sup>③</sup>,到张仲谋将之付诸明词研究的实践,再到余意对“再造明词研究话语”的倡导,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努力去贴近明词。如果新一代的学人只是重复前贤的视角和观念,而没有新的创见和突破,那么明词研究顶多是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深化。

至于“换代”的第三层意思,指一代有一代学风的契机。这里所说的“一代学风”,主要指“一时代的学风”(以十年、二十年不等为断限),而非“一代人的学风”(这属于第二层意思的范围)。

十年前,《全明词》问世时,除张仲谋《明词史》、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外,其他领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过去十年,是明词研究崛起的十年。《全明词补编》、《明词话全编》、《金元明人词话》等古籍整理成果纷纷登场,谢旻琪《明代评点词集研究》、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张若兰《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苏菁媛《晚明女词人研究》、王秋文《明代女词人群体关系研究》、郑海涛《明代词风嬗变研究》等青年人著述陆续推出,各类学术刊物上的明词研究论文已有三四百篇之多。就在眼下,张仲谋《明代词学通论》、丁放等《宋元明词选研究》、赵义山等《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刚刚问世,余意的《明代词史》出版在即,周明初重编《全明词》的计划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而提上日程,明词研究的面貌不可谓不欣荣。但如果我们用更长时段的眼光去看过去的十年,其实这十年最显著的成果在两方面:一是明词的搜采和补遗,二是明代词学文献的考订和整理。总的来说,这两块仍属于文献层面的突进。而在理论层面上,虽然填补了很多空白,但在纵深力度上尚不如人意。笔者展望接下来的十年,将是明词研究走向纵深的十年。各类深入式的对话、商榷和重构,将取代平铺

① 参见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3页。

② 余意、齐森华《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③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式的主题研究,成为明词研究的新模式。这将是一个从无维度到单维度再到多维度的不断成熟的学术史过程,即明词研究从毫无规模可言的“散兵游勇”式(20世纪),历经众志成城的文献整理和填补空白之努力(本世纪初的十至十五年),然后进入一个多元对话和开放的新阶段。

我相信,利用最近十年的明词研究成果,足以建构起一个明词研究的基本体系框架。再多征引一些古籍材料,多添加一些论点注脚,即使没有太多的新意和创见,也能写出一部规范、合格的明词研究的入门读本。但是,这种建构是平面式的、拼盘式的,将不得不充斥大量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且这些话题之间未必构成很严密的整体理论联系。这样搭建出来的研究体系,缺少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深度观照,很难抓住明词研究的未来脉动。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类似的研究体系可以让明词研究的领域更加充实和完善,却无法展现出明词研究的自身特色和独有结构,也无法将明词研究引上变革性的发展之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停地换代思考,融汇各家说法,讨论建构明词研究新体系的一些前提基础,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三层,包含了较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笔者以为,代表了整个明词研究的发展方向,这种趋势非个人所能左右。而在更宽广的层面,“换”所指向的,绝不仅是“换代”,还应包括“换位”,即研究者对“明”与“词”二字的关注点的不同。如何在强调“明代词的研究”和“明代的词研究”的同时,也不忽视“词的明代属性研究”,是词学学者较之明代文学学者更强势地进入明词研究领域后必须留意的一个问题。

过去十年,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人,他们通过撰写有关明词研究的博士论文而在学界立足。如陶子珍的《明代词选研究》(台湾东吴大学,2001年)、余意的《“词学吴中”与明代词学之重建》(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张若兰的《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苏菁媛的《晚明女词人研究》(台湾彰化师范大学,2008年)、凌天松的《明编词总集述评》(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岳淑珍的《明代词学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郑海涛的《明代词坛与词风嬗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汪超的《明词传播述论》(上海大学,2010年)、许秋群的《中晚明词的传承与新变》(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薛青涛的《明词与阳明心学》(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等,皆是其中的代表作品。除了苏菁媛外,其他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硕士论文都是有关宋词研究的(苏菁媛的硕士论文为《陈子龙词学理论及其词研究》)。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从词学领域进入明词研究的,词学理论的基础非常扎实,擅长对词史的纵向宏观把握和具体词作的静态审美阐释,但在对明词生成的文学生态环境的体察及与其他同时代文体的横向比较上,则显得不那么纯熟。笔者以为,由明入明词和由词入明词,两者的取法路径应存在不小的差异,就明词研究的长远均衡发展来看,词学理论素养的积淀固然很重要,但对明代文学及其社会文化环境的整体把握同样不可或缺。随着明词研究的深入,唐宋词视域下对明词的观察日渐常态化,学界亟需一批专攻明代文学和文化的学人进入到明词研究的领域中来,注入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如何挖掘“明代”的长处,或许将是明词研究走出困局的一条重要线索。

### 三 “方法”之先:打开明词研究的立意和路径

21世纪,注定是一个强调研究维度的世纪。但我们追求的所谓新方法、新视角、新理念,并不是为了“新”而新,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论述的“深”,为了学术史的推进。上文所说的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明词,效仿宋词研究而活学现用;作为审美形态的明词,欲自立话语系统而与他代迥然有别。效仿别人也好,自立门户也罢,至少没有尝试去走一条跳出“明词”、引领“他词”的路。这一方面当然跟明词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有关,学术史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没有扎实的地基,即使“高屋建瓴”,也只是“七宝楼台”;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明词研究者的立意甚卑有关,自己先放下身段,将明

词及相关现象定位为词史中的二流、三流，又如何写出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呢？

笔者以为，明词研究作为“方法”之先，至少可从两个层面来考虑。首先，一代有一代词的特点，任何断代词都有它在某一领域的先天优势，对于这种小领域内的“方法”之先，要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如唐宋的词乐，元词的东亚视野，明代小说、戏曲中的词，清代的女性词、郡邑词等。举例而言，词乐理论的建立，无疑应以唐宋词为主要考察对象，由此形成的理论方法，用来阐释词乐式微后的金元词、明词、清词的音乐世界，基本没有问题；又如想建立一套阐释女性词的话语体系，则晚明及整个清代的女性词才是最合适的考察对象，我并不认为对李清照、朱淑真的个案研究能对明清女词人研究有实质性的帮助，反之，在明清女词人群体研究的基础上生成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式，如北美孙康宜、魏爱莲、方秀洁等人的女性视角，或许可以为历代女词人的深入考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同理，明词也有自己的优势，如前面说过的明代小说、戏曲中的词，明词的功能化和日用化等。再举一例，即明代的诗词曲文体互动现象。虽然这一现象在元代就已进入视野，赵维江《金元词论稿》、陶然《金元词通论》也作了专节甚至专章的详论，但我以为这一现象在明代的演变非常复杂，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虽已有张仲谋、胡元翎等人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不小的深入、拓展的空间。

众所周知，词的诗化始于宋，词的曲化始于元。而如前所说，明词是前代词和明代文化的综合产物，反映在文体互动上，亦是如此。一方面，从北宋苏轼直到南宋末年，“以诗为词”之法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文学传统，足以脱离词乐而独立生存；另一方面，传奇作为有明一代之胜，对失去唐宋词乐依托的明词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以“新”词乐的姿态出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撇开功能化的趋向不论，在明词内部，诗化和曲化是两个不容忽视的并行发展方向。但在传统的研究者看来，词的诗化将宋词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而词的曲化则被视为其演变过程中的一道魔障，这多少仍是用雅文学的标准在观察词的发展。胡元翎提出可从“音乐文学”的角度来放宽阐释“词之曲化”<sup>①</sup>，别开生面，给人启示颇多，但词的诗化与词的音乐属性之间并非截然二分（比如民歌一块）；而且元明词的曲化，本质上到底是音乐化，还是通俗化，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传统所说的以诗为词、以曲为词，是指在有明确分体概念下的格调、意境的诗化，章法、句式的曲化，而明代文人大多认为诗词同源，词曲不分，词可以杂入乐府诗卷之中，词、散曲同卷混编亦习以为常，传奇视野下的无换头曲调与词调混为一谈，在这种观念下的诗词曲互动，其内涵是否等同于自觉意识下的词格、词境、词法的拓展和演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能以新编《全明词》项目对明词体式界定的客观需求为契机，以元明词的曲化这一时代现象为切入点，探究明代的诗词曲互动问题，并提出一些可推而广之的概念和方法，亦不失为对其他断代词研究的一次有益启示。

而在“方法”之先的第二个层面上，所有断代词研究的起点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某个断代词研究自身去总结方法，而是外来文学或文化理论的合理引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我们没有理由去盲目地排斥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介入。这个时候，唐宋词较之金元词、明清词在学术积累方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现今大多数词学新方法的使用，如范式研究、传播研究、定量分析研究等，都是在唐宋词的园圃中开花结果的。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唐宋词研究的发展瓶颈需要有人去突破，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唐宋词在词人、词作、词调、词乐、词籍、词论等方面的研究深度，为外来理论和范式的介入提供了一个高度成熟的平台，这种积累和储备是其他断代词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不过从理论上讲，每个朝代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明词研究同样可以引入各类跨文化、跨学科的新方法，先为我所用，然后再为其他断代词研究所用。比如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对解释中国古代文人社交网络中的一些文化现象来说，不失为一剂“新药”，已有学者在作一些探索性的尝试<sup>②</sup>。当然，如何将其化用于

① 胡元翎《“词之曲化”辨》，《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② 汪超《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以明代女性词人为例》，《中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无形，与中国传统士人世界和文学思想完美相融，才是看出学人功底和水平的地方。

当然就现实而言，在明词微观研究尚未实质性起步的情况下，对宏观方法的尝试是需要谨慎对待的。现今对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证，仍主要依赖《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中的词人小传；对词作的系年和本事的考证，在20世纪90年代的《明词纪事》后，一直未有推进；对明代类型词（如幛词、寿词、歌诀词、应制词、应景词等）的结构、技法、用词、仪式化等要素的研究，也是一片空白。无论是文献史实的坚实度，还是文本阐释的精细度，都无法支撑住外来理论的大量涌入并使之生根发芽。从这个角度来讲，坚持几分保守姿态是必要的。只有在遵循学术史渐进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保持微观、宏观甚至中观研究的齐头并进，才是明词追赶其他断代词研究并摆脱亦步亦趋形象的一条明路。

#### 四 “名篇”之立：回归文本与明词经典化的起步

如前所言，建立一套与明词特性相匹配的话语系统，是不少明词学人的一个心愿。无论是更宽阔的词学文化考察，还是更新颖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尝试，虽然涉及范围远远超出了明词审美的范畴，但在某种意义上，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回归作品本位。如果再深入的研究仍无法清晰地阐释明词的“异量之美”，再异量的美丽仍无法在学界和整个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同，那么，明词研究即使视野何等宽广，质量何等过硬，也只是学术界内部的风起云涌，而不可能推出一批在社会大众中耳熟能详的作品。

《全明词》出版至今已十余年，学界对明词定位、名家、流派、文体互动等话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却很少有人能背出几首明词名篇来。除了“滚滚长江东逝水”借《三国演义》开篇词而妇孺皆知外，其他的明词作品并没有获得稳定的文本认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千年词史中最弱一环的明词，在其总体的文艺价值被认为不及唐宋词和清词的前提下，它的某些作品在当代社会是否还有经典化的必要？符合唐宋词审美标准的那部分明词，是否比挖掘出“异量之美”的作品更容易受到普通读者的认可？

笔者以为，明词经典的塑造还是有必要的。首先，尽管学界对明词的文本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向有微词，却并不妨碍我们从现存的两万多首作品中细选出几百首佳构，宏观上的整体颓势不意味着可以对具体的某些作品作出率意的忽视或否定。其次，在明词文献的整理工作已经趋于成熟的基础上，过于滞后的文本研究现状，难免会对日渐活跃的明词理论研究产生一定的掣肘作用，这样不利于明词研究朝更纵深的方向发展。最后，撇开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下不谈，仅从大众普及的角度来看，适量的明词赏析也有利于普通读者形成更加连贯、全面的文学史观。

明词的经典化可以有很多途径，比如建立一套明词独有的评价体系，或者不断地重写通代、断代词史，但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先编一本《明词选》。随着《全明词》、《全明词补编》的出版，以及一系列明词研究著述的问世，编选的时机相对来说已经成熟。因此，以下文字不仅是对明词研究回归文学本位之路的一些思考，也是在编纂《明词选》之前对编选思想的一次学术史回顾和建议。

严格意义上，明词的经典化，不是应《明词汇刊》或《全明词》的问世而生的，是应明词自身的发展而出现的。就明清选本而言，现有四部明词选存世，即明钱允治编《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沈际飞编《草堂诗余新集》，清顾璟芳等编《兰皋明词汇选》、王昶编《明词综》。至于历代编纂通代词选而涉明词，则数目更为庞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明词的经典化始于明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程。我们现在要做的，确切地说，是明词的当代经典化，是摆脱《明词综》编选观念和当代唐宋词研究视域的新经典化。20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选和鉴赏辞典的风气大盛，明词也在诗词鉴赏的浪潮中初露头角，夏承焘《金元明清词选》（明代六十一人一百二十首，下同）、唐圭璋《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七十二人一百三十六首）、王步高《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六十四人一百二十六首）、黄天骥



《元明词三百首》(一百一十八人二百零八首)、孙文光《明清词三百首》(三十四人九十九首)、钱仲联《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九十七人一百七十首)等选本<sup>①</sup>,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当下明词名家名篇的基本格局。学界对优秀明词作品的体认和阐释,也从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典选本和评点之学,开始走向新文学思潮指引下的文本阐释之学。

反观明词早期经典化的历史,可以看出,晚明清初《类编笺释国朝诗余》、《草堂诗余新集》、《兰皋明词汇选》的选词更具多样性,而《明词综》的选词更具趋向性。考虑到《明词综》的流传广度远远超过了前面三家,则这种崇尚醇雅的浙西词风,对明词经典的早期定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明词汇刊》影印本和《全明词》没有出版之前,明词的当代经典化的第一步,带有明显的文献依赖痕迹。无论是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坛巨擘,还是王步高、黄天骢等学界名家,都存在这方面的遗憾,永乐至万历年间的词尤为明显。再考虑到《明词综》、《国朝词综》中存在大面积的擅改原作现象,那么,更深层次的局限还包括后来选家的审美取向在无意识中被约束和引导。如何将以《明词综》为代表的明词旧经典,转化为当代学术视野下的明词新经典,是当代经典化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撇开《明词综》的影响不谈,我们还得考虑到,由于受编纂体例的要求,夏、唐等人采用的是多个朝代相连贯的通代视域,更确切地说,是唐宋词研究视域下的通代视域。编者不仅用传统的唐宋词审美标准来挑选明词,还要在与金元词、清词佳作的纵向对比中作出取舍,并展现出一条相对连贯的元明清词史线索。明词在整部词选中的比重,除了黄天骢《元明词三百首》占到69.3%外,其余各本都没有超过30%(夏本25.8%,唐本19.1%,王本15.4%,孙本22%,钱本20.2%)。这种编选过程中的侧重点的不同,造成了不同选家之间对明词的价值取向亦有差别。比如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作品相对较多(朝代归属尚有争议),明中期的作品较少,且与《明词综》所录的重复度太高;又如因选录明词的总数不够多,以致人均作品数太少,一流词人和二、三流词人无法量化区分开来;另外,古代小说、戏曲中词的原创性虽然不强,但就具体时代而论,明传奇中的一些佳作(如汤显祖词),理应区别对待并作进一步的挖掘。总之,编一本全面、纯粹的断代明词选,还是很有必要的。而如何跳出前贤名家当时有限的文献和观念视域,进入更宽广的审美空间,注入更进步的时代意识,是新世纪的编选工作必须直面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由上可见,明词的当代经典化,决不仅是凭一己私好挑选出几百首作品那么简单。真正的经典化,必须对学术史有充分的认识,必须建立在数量庞大的文本阐释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编纂一部明词选和建立一套明词评价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二者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体会明词的妙处,以及知道这些妙处是如何而来的。绕了一圈,明词研究还是回到了文学本位,但不再是原来人们眼中的宋式明词,而是一代有一代特色的明词。

[作者简介] 叶晔,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sup>①</sup> 夏承焘等《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唐圭璋《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王步高《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黄天骢等《元明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4年版;孙文光等《明清词三百首》,黄山书社1999年版;钱仲联等《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